深港聞人劉鑄伯：生平、志業與意義*

蔡惠堯**

摘要

英國割占（租借）香港地區後，逐步建立一套切中香港實情而行之有效的資本主義統治架構，政制日臻成熟，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香港成長為國際性中轉貿易中心。香港奇跡的誕生，固然與英國統治政策、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持續影響息息相關，亦與香港華人自強不息的奮鬥密不可分，而其中，華人領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依靠強大經濟實力而崛起的香港華人領袖不斷要求變革，積極投身公共領域管治，拓展和改善生存空間，為香港社會的早期發展作出卓越貢獻，成就有目共睹，影響及至於今。不僅如此，由於地域和血緣關係，他們參與內地建設，支持革命運動，成為促進中國近代化的有力推手。

本文研究對象劉鑄伯（1867-1922），籍貫深圳平湖，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的政、商、學、醫各界。劉鑄伯在潔淨局、定例局等政府機構任內，為改善華人待遇而建言獻策；擔任華商總會、東華醫院、保良局、育才書社等民間公共組織要職，傾盡心力謀求華人福祉；在家鄉平湖，因應廣九鐵路開築，獨資建造平湖新墟，初步奠定平湖墟作為深圳、東莞、惠州三地交接處中心城鎮的規模和地位，堪稱近代深圳地區市政建設的典範。

劉鑄伯在深圳、香港甚為知名。他身上既具備同時代的其他華人領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努力爭取華人福祉的共性，也有自身鮮明的行事個性和思維特色，時空環境的制約在他身上的烙印亦顯而易見。通過劉鑄伯個案研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知、判斷香港華人領袖的角色定位，對深化香港社會整體或個案研究也有參考意義。

關鍵詞：二十世紀初期、深圳、香港、劉鑄伯、志業、意義

---

*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富於啟發性的寶貴意見，文中已經儘量吸納，唯文責仍由作者自負。文題中的「深港」，或稱「港深」，乃深圳、香港兩地合稱，現已成為具有共識的慣用語。

** 廣東省深圳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一、緣起：香港的華人、華商與華人領袖

英國憑藉 1842 年《江寧條約》割占香港島、1860 年《北京條約》割占九龍半島南端、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開啟香港歷史發展新里程。作為英國在遠東地區的第一個直轄殖民地，在無成例可循的前提下，英國政府逐漸在香港建立一套既能體現殖民統治精神、符合英國法治原則，又能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統治架構。在這種既定的“遊戲規則”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循序漸進、自強不息，努力調適中西差異，爭取更多的政治權益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的領袖群倫扮演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

據英國統計資料，英占前香港人口約 4,000 人。1841 年 1 月 26 日，英國強行占領香港島；5 月，英國公布港島人口為 7,450 人。次年 3 月，全島人口上升至 15,000 人。此後，香港人口總體上持續增加，至 1911 年，超過 45 萬人。¹華人占了人口的絕大部分，其餘為英國、葡萄牙、印度等國人士。開埠初期，居港華人主要以體力勞動謀生，從事農業、漁業和打石等工作。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後，中國內地包括廣東省戰亂頻仍，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等事件，導致內地的富商大賈、買辦權貴紛紛逃難至香港，香港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藉此發展轉口貿易，香港商業逐步繁盛，一批長袖善舞的華商應運而生，華人領袖遂鶴立於其中。他們手握香港經濟命脈，代表華人行使政治權利，主導華人文化話語權，在複雜多變的中外局勢、微妙詭秘的中英關係、香港普通華人與己身利益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存和發展，筆路藍縷，縱橫捭闔，為香港的早期騰飛立下永難磨滅的汗馬功勞，對香港社會進程產生深遠影響。不僅如此，由於地域觀念和血緣因素，香港華人領袖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千絲萬縷，不遺餘力地參與內地各項建設事務，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刻下深刻鮮明的時代印記。

---

¹ 劉澤生，《香港古今》（廣州：廣州文化出版社，1988），頁 237-239。

近些年來，學界對香港華人、華商、華人領袖的問題投入更多關注，著述成果豐碩，涉及領域寬廣，頗見功力。²香港歷史豐富多彩，香港歷史研究碩果累累並繼續開花結果，相關歷史人物研究方興未艾，正如研究者所言：要「明辨香港全部歷史的規模和複雜性」，需要「集體的努力；」³同樣，只有儘量多的個案研究，才能集腋成裘，以窺香港歷史全貌。因此，可以預期，隨著時間推演和成果積累，更多的饒有興味的香港歷史研究課題將會被發掘，日益凸顯其深度和重要性。

本文研究對象劉鑄伯（1867-1922），既有著作中偶爾被提及，零散敘述多，系統闡發少；將其附屬其他研究之中順帶而出者有之，獨立成篇者尚付闕如。這與他為香港社會發展所做的勞績及作為香港華人領袖的地位不相稱。筆者在吸收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搜集當時的報刊資料、檔案文件，爬梳整理劉鑄伯建設香港及其家鄉——深圳平湖的重大事蹟，擇其犖犖大端者，撰

---

² 以筆者有限閱讀量所見，中文代表作有：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王賡武，《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2001）；鄭宏泰、周振威，《香港大老——周壽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等；英文代表作有：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Singapore: Graham Brash, Reprinted, 1990)；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Chan Wai-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G.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Cornelia Lichauco Fung and Yiu Chuen Wan, *Fung Ping Shan, The Man, His Life and His Library*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H. K.] Ltd., 2012) 等。

³ 王賡武，〈序〉，《香港史新編》（上），頁2。

成此文，以期為探尋二十世紀初期香港華人領袖成長軌跡提供一個個案研究範例。⁴筆者認為，與既存研究相比，劉鑄伯的個案研究不僅必要，而且兼具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並且希望通過這項研究，對進一步認知、判斷香港華人領袖的角色定位，推展深化香港社會整體或個案研究有所裨益。

二、生平：劉鑄伯的成長經歷

劉鑄伯，名鶴齡，字守真，鑄伯乃其號，1867年6月5日生於香港，原籍新安縣平湖鄉（今屬深圳市平湖街道辦事處⁵）。早年就讀於西營盤馮富義學。12歲時父亡，母親伍氏含辛茹苦，供其繼續讀書，旋考入官辦的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由於成績優秀，1883年，獲得庇理羅士（Belilios）⁶獎學金。1885年，成為第一個獲得史超域（Stewart）⁷獎學金的學生；同年畢業後任職於香港天文臺。1888年開始，從事買辦工作；同年，受臺灣巡撫劉銘傳之邀，任淡水西學堂教員（後任總教員）兼洋務委員。1890年，開始經營茶葉生意，由此經商致富。1893年，任屈臣氏

⁴ 劉鑄伯逝世後，其子劉富宗等撰有〈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此文承蒙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劉蜀永先生提供，特致謝忱！），詳述劉鑄伯生平行事。劉鑄伯的社會活動資料，散見於當時香港的中西報刊。今人研究著述，可參《劉鑄伯資料》（內有〈愛國港胞劉鑄伯〉〔手抄影印本〕及1978年3月18日平湖人民公社繪製的「平湖人民公社老圩鎮房屋四至圖」〔影印件〕，深圳市平湖街道辦事處僑聯提供，特致謝忱！）；王根喜，〈古鎮平湖與傳奇人物劉鑄伯〉，《深圳商報》（深圳），2003年7月5日，B7版；彭全民，〈愛國港胞劉鑄伯及其評價〉，《寶安史志》，總第15期（深圳，2005.12），頁52-59。另，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頁5-6；寶安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寶安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頁79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寶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寶安文史》，第三輯（深圳，1990.12），頁64-65、頁68-70；管林主編，《廣東歷史人物辭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頁148；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46-247 等亦有小傳。

⁵ 深圳市的區域及名稱歷經變更，可參閱拙稿〈前世今生話深圳——地域變遷與名稱由來〉，《廣東文獻雜誌》36：1（臺北：臺北市廣東同鄉會，2008.1），頁57-67。

⁶ 庇理羅士（Belilios, 1837-1905），著名英籍猶太裔慈善家，1868年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並於1876年擔任主席。

⁷ 史超域即Frederick Stewart（1836-1889），1862-1881年擔任首任中央書院校長。

(Wastons)大藥房⁸買辦。1905年，曾任北洋漁業總辦兼洋務會辦，未幾離職。從1897年之後，劉鑄伯相繼出任東華醫院董事局成員、總理、主席，潔淨局⁹局員，育才書社司理，保良局¹⁰總理，華商公局及香港華商總會（今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廣華醫院倡建總理，定例局¹¹局員，香港第二大華資銀行——大有銀行創辦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等職，參與創辦華人足球隊（今南華體育會）、香港華人核數研究會（今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香港大學、香港仔兒童工藝院（今香港仔工業學校）等。1911年，因應廣九鐵路即將通車的情勢，他獨資在家鄉深圳平湖建設新墟鎮，改善了深圳及附近地區的民生狀況，成為近代香港商人投資深圳的嚆矢，樹立近代深圳市政建設的典範。1922年5月3日，劉鑄伯于香港病逝；6月15日，歸葬家鄉平湖。¹²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華商逐漸確立在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角地位，並成為主動推動香港政治民主進步的力量。劉鑄

---

⁸ 屈臣氏大藥房，前身為1828年創辦於廣州的廣東藥房。1841年廣東藥房在香港創立香港藥房。1858年，屈臣氏醫生（Dr. Alexander Skirving Waston, 1837-1865）擔任香港藥房經理。1871年，香港藥房正式註冊為A. S. Waston & Company（屈臣氏公司）。1886年1月19日，屈臣氏有限公司獲發公司註冊書。

⁹ 潔淨局（Sanitary Board）於1883年成立，1936年更名為市政局。1985年，成立區域市政局（Regional Council），負責為新界地區提供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娛康樂設施、管理食肆等市政服務。2000年1月1日，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解散，其職能相應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衛生署行使。

¹⁰ 保良局（Po Leung Kok），又稱保良公局，一批東莞僑港商人倡創於1878年，1880年港督軒尼詩正式批准設立，以「保持安民」為宗旨，主要工作為防止誘拐、保護無依婦孺、協助調解家庭及婚姻糾紛，現已發展成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的組織機構。

¹¹ 定例局（Legislative Council），根據香港首份憲法《香港殖民地憲章》於1843年成立，1844年1月11日召開首次會議。定例局後改稱立法局。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成立，行使原港英政府立法局的功能。

¹² 此段關於劉鑄伯的生平文字，參考上述文獻資料外，還參考了1922年5月4日《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5月3日*The China Mail*（《德臣西報》），1922年5月4日*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香港仔刺沙西報》），1922年5月3日*The Hong Kong Telegraph*（《士蔑西報》），1922年5月4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等報刊報導劉鑄伯病逝的消息，以及南華體育會、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香港仔工業學校等的網站資源。必須說明：第一，現有一些著述指劉氏生於1866年，今據上述資料訂正為1867年。第二，關於劉氏曾就讀於聖保羅書院、畢業於牛津大學以及任職煙臺大學教授等的經歷，由於未能取得有力史料的支持，故未貿然入傳。

伯的教育和工作經歷等個人因素，加之中西交雜、傳統與現代並行的時空環境，形塑了他的人格特質、行事風格和價值觀念，概括而言，他對香港政、商、學、醫各界均卓有建樹：在潔淨局局員和定例局局員任內，他為減輕民疾而大膽呼喊；先後擔任華商公局、香港華商總會主席之職，革新會務，凝聚全港華商力量，奠定華商總會的厚實根基；致力於普及教育，創立育才書社，舉辦孔聖會義學，施惠萬千學子；出任東華醫院主席，倡建廣華醫院，採取積極措施改善華人醫療條件。所以，劉鑄伯參與並見證早期香港的發展蛻變，為香港華人主角地位的崛起、形鑄作出了貢獻。

毋庸諱言，綜觀劉鑄伯的一生，並非盡善盡美、無可挑剔，事實上，他入讀的中央書院的早期畢業生頗受部分時人之不齒；他投入社會工作後，在每次歷史洪流中，對他的質疑非議與理解贊成均所在多有、不一而足。這並非單個現象，而是一個複雜時代、複雜環境所使然，只不過劉鑄伯的個案更具研究價值。

劉鑄伯主要任職一覽表

年份	任職機構	職務
1893	屈臣氏大藥房	首席中國助理、買辦
1897	東華醫院	董事局成員
1899	東華醫院	總理
1899-1911	潔淨局	局員
1901	育才書社	司理
1901	中華會館	總董
1903-1904	保良局	總理
1906（下半年）	華商公局	主席
1907-1910	廣華醫院	創院總理
1908-1909	華人足球會	會長
1909	香港大學募款委員會	委員

1909-1910	東華醫院	主席
1913	香港華人核數研究會	會員
1913-1922	香港華商總會	主席
1914-1922	定例局	局員
1914	大有銀行	創始人、股東
1921	香港公民貯積金有限公司	創辦人
1921	香港皮革有限公司	倡辦人、董事人

資料來源：①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網站（www.scaacpa.org.hk）資源。（查閱時間 2012 年 11 月 22 日）②南華體育會網站（www.scaa.org.hk）資源。（查閱時間 2012 年 11 月 22 日）③“OBITUARY”，*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3 May 1922, p. 5.④〈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⑤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香港：香港中華總商會，2002）。⑥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 21、231。⑦《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頁 5-6。⑧《香港大老——何東》，頁 118。⑨保良局百年史略編輯小組委員會，《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香港保良局，1978），頁 222。⑩《香港華字日報》，1921 年 11 月 14 日，第一張第二頁、11 月 15 日，第一張第二頁

三、政界生涯：從潔淨局局員到定例局局員

香港開埠後，英國政府逐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架構，其中既有官方機構如港督、行政局、定例局，以及政制體制如司法制度、公務員制度等，也有半官方諮詢機構如潔淨局、團防局等。官方機構長期排斥華人進入，直至 1880 年情況才有所改善（詳下文），而半官方機構所轄事務多與華人民生息息相關，所以華人較早參與，扮演積極角色。劉鑄伯擔任潔淨局局員，即為例證。

英人初期在香港，明顯“水土不服”，疾病迭起，城市建設中的排汗排水、街道清潔與修整、衛生系統及條例等問題極為突出，亟待解決。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衛生問題，1883 年，港府成立潔淨局，專責港島及九龍地區市政衛生環境事務，具體負責監察街道清潔、授權檢查民房，草訂新的公共衛生條例。1886 年，港府委任 4 名非官守局員，其中一人是華人醫生何啟，開了華人進入潔淨局的先河。何啟站在全體華人的角度，對港府的衛生條例

及政策提出多項意見。¹³1899年，劉鑄伯被委任為潔淨局局員，¹⁴亦秉承何啟的做法，對關乎華人切身利益的衛生問題屢有建言，凡是對華人不利的法例規章，「必據理辯爭；爭之不獲，則奮髯抵，幾未嘗少屈，務得當乃已。」¹⁵

1894年5月，香港爆發鼠疫，港府於當月制定衛生緊急附例，其中規定潔淨局人員有權進入任何屋宇檢查、消毒，甚至搬移、銷毀屋內物品，禁止華人居住在不合衛生的屋宇等，這些措施對華人造成的不便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實施之始，華人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如何在執行消毒措施的過程中減少對華人的侵擾，最為劉鑄伯所關注。

為了消弭疫症，港府絞盡腦汁，包括將受疫屋宇收回拆毀和強制消毒潔淨等，而消毒辦法，也因應效果而時有改變。1898年，港府將原先以焚燒硫磺和以煤炭洗劑清洗地面的做法，改為以一比一千的水銀高氯化物溶液噴洗牆壁及地面，然後盡開門窗，期間住客必須搬離，數日後方可返回。1901年，港府參照外國經驗，制定熏洗章程，改用熏洗消毒的做法，但對於這一新法，局員出現不同意見，華人亦不以為然。在11月22日潔淨局會議前，劉鑄伯提出與熏洗屋宇相關的十八個疑問：

一問，何等行免熏只洗？行與店如何分別？二問，凡熏洗行、店是否預先通知該東家，著設法往別處暫造生意？如系通知預先若干日，有何地方俾暫造生意？並失誤生意賠償否？三問，准預先搬貨物否？准搬貨物工錢歸誰支給？貨又搬往何處暫貯？四問，在熏洗各約之住眷屋是否盡行熏洗？五問，倘有免熏洗者，當如何辦理？六問，辦理免熏章程系何人？七問，病人逐出街否？八問，倘不逐出

¹³ 詳參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頁38-49。

¹⁴ 劉鑄伯被委任為潔淨局局員時間，據〈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劉鑄伯被選為東華醫院總理的同時，被委任為香港潔淨局員（頁2，下）。劉氏於1899年擔任東華醫院總理，可知他同年出任潔淨局局員。

¹⁵ 劉富宗等，〈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頁3，下。

街，何人往驗其人病否？九問，潔淨局照例有權逐居民離屋否？十問，雨天著居民出街否？十一問，如雨天亦著出街，能否覓合宜地方，俾一出門便可到藏身，無礙乎安聚否？十二問，每層屋之住眷准否攜衣服、首飾出門？絲綢、皮草亦准攜否？十三問，倘絲綢、皮草不准攜，倘有失去，為何人是問？十四問，每日四點鐘前能否返回屋裏，及要熏洗各約何時方能完工？十五問，貨倉免洗否？十六問，凡鋪戶內有人居住買賣及貯貨者，是否作貨倉論？十七問，如不免洗，將其貨物何為？十八問，據潔淨局謂，凡毀壞什物確有憑據者方賠償，此節歸何人核理？是否由幫辦決奪？¹⁶

真可謂巨細無遺，悉數在心！在11月22日的會議上，劉鑄伯委婉地指出，他已與潔淨局醫生談及此事，並非不同意熏洗章程，「特欲辦法無礙華人」。他結合會前與另一華商馮華川聽取的華人意見，在會上提出五點要求：熏洗屋時，在屋前搭設帷幕，安置婦女幼童；提前三日通知熏洗，准許居民在本約內遷徙居住；延期熏洗病人之屋；具體熏洗時間由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雨天不可熏洗。這些要求當場獲得通過。是次會議，還議定「能將就華人而無礙於辦事則可矣」的熏洗消毒原則。¹⁷

華人對港府消除疫症的政策一直甚為抗拒，特別對於收地拆屋和消毒潔淨的做法，公開反抗者有之，離港返鄉、空置屋宇者有之，造成政府與華人的持續矛盾。雖然從改善公共衛生的角度考慮，港府始終強勢施政，但劉鑄伯所提建議合情合理，也可緩和華人抵觸情緒，港府在維持政策原則的前提下，當然樂於順應民意，採納施行。

雖然港府千方百計意圖消除疫症，但事與願違，疫症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幾乎每年的春末夏初，必定肆虐香港，港府唯有不斷收緊防疫條例，華人所受侵擾，年逾一年，以致貧困華人

¹⁶ 〈劉君鑄伯辨詢〉，《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11月22日。

¹⁷ 〈潔局聚會〉，《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11月22日。

「家有患疫者，雖多方勸捐，仍有隱匿不報，甚至棄屍道旁」，¹⁸「資財豐裕之家，苟有一染病，則暗中遷離港地」，¹⁹貧者、富人受害無算。劉鑄伯尖銳地指出：這些都是執行防疫章程過於嚴厲所致，如：與疫者同住者必須將舊衣脫去消毒，換穿潔淨局衣服，而未獲發還舊衣，以致每受寒凍之苦；負責消毒局員所穿的衣服從未消毒，反復穿著，隱患尤大；強制隔離，母子不能親，夫妻不能會；局員態度傲慢蠻橫，毫無人情可言，等等。他認為：「所行防疫章程，原意無非欲以杜絕傳染之患，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轉足以速其患，因華民見之已屬心驚膽寒，乃更欲其守例而行，勢必陽奉陰違，於是不得不冒險設計，使病者藏匿，及至死後，則棄屍道旁，與原人風俗相悖，在所不計。」²⁰他進一步指出，「苟非將歷年辦疫之法再加改良，使民心安靜，其患將永無寢息之時，且華民何以至於斯極，其故有自來矣。」²¹當務之急，必須從實際出發，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查向日防疫定章與及辦理之法；一、查棄戶之由並如何改良，使華人協力相助；一、辦理務將刻下居民之艱苦認真減輕為是。」²²這些建言基於與華人的長期接觸，對華人所受之苦如同身受，故此能從現象透視本質，鞭辟入裏，並能提出標本兼治的解決辦法。

劉鑄伯任職潔淨局局員的十二年間，正值香港受到鼠疫困擾之時，華人受累最深最重，設法減少直至消除華人所受之苦，成為他任內工作的主要目標。每當熏洗樓屋時，劉鑄伯必親臨現場監視，不應熏洗的嚴厲禁止，應該熏洗的嚴禁過度擾民，是故，「民居市肆，多獲保全」。此外，力促港府革除染病家庭禁遷之

¹⁸ 〈劉君鑄伯致潔淨局論辦疫書譯錄〉，《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5月4日。

¹⁹ 〈劉君鑄伯致潔淨局論辦疫書譯錄（三續稿）〉，《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5月8日。

²⁰ 〈劉君鑄伯致潔淨局論辦疫書（再續）〉，《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5月7日。

²¹ 〈續劉君鑄伯致潔淨局論辦疫書譯錄〉，《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5月5日。

²² 〈劉君鑄伯致潔淨局論辦疫書譯錄（三續稿）〉，《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5月8日。

例，「民始安集而市肆漸復舊觀。」²³1904年之後，鼠疫情況漸見好轉。1923年之後，鼠疫基本絕跡，不復再現；此時劉鑄伯已經去世，但他為消滅鼠疫所作的貢獻，值得永遠記取。

劉鑄伯最為人側目的另一政界任職，是他定例局局員的身份。1843年4月，維多利亞女王先後簽署《英王制誥》(Letters Patent)、《致璞鼎查訓令》(Instructions to Sir Henry Pottinger)，宣布以女王親自委任的總督為香港最高軍政首長；官方任命的議政局(後稱行政局)擔負諮詢職能，另一由官方任命的定例局負責通過法律，並對兩局議員的任命、兩局的權力、立法程式、選舉事宜、英國對香港立法的限制等作出規定；總督對兩局具有控制權。這個行政架構奠定了英國統治香港的基本模式。定例局的主要職能是向港督提供有關立法的參考意見，並通過港督要求制定的法律，從嚴格意義上說，它並非名副其實的立法機關，而是諮詢機構，充當港督行駛權力的一隻棋子。定例局由清一色的英人組成，長期排斥占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隨著香港華人數目大增，華商逐漸擁有不容忽視的經濟實力，1878年起便上書港督，要求讓華人參與「管理本殖民地的公共事務。」²⁴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意識到「是時候在定例局安排一個代表香港華人利益的人了。」²⁵華人律師伍廷芳獲得軒尼詩的極力推薦和華商領袖的一致擁護，²⁶於1880年2月擔任定例局臨時議員。雖然這是一個臨時職位，加之定例局惟港督之命是從，但它揭開了華人進入香港殖民統治機構，參與管治事務的歷史篇章。伍廷芳三年任期屆滿後，黃勝正式獲任為定例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²⁷這個舉措成為總督寶雲(George F. Bowen)在任期間

²³ 〈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頁3，上-下。

²⁴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87, No. 4, p. 49。

²⁵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87, No. 4, p. 47。

²⁶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87, No. 4, p. 56-58。

²⁷ 定例局成立之初，由港督、副港督、輔政司及總巡理府組成。1850年6月，商人大衛·查頓(David Jardine, 生卒年不詳)和埃傑爾(J. F. Edger, 生卒年不詳)首次被委任為非官守議員。1880-1941年，先後有18位華人被委任為議員，依次為：伍廷芳、黃勝、何啟、韋玉、劉鑄伯、何福、陳啟明、周少岐、周壽臣、伍漢稗、羅

「意義最重大」²⁸的政績。從此，定例局設立永久的華人議席，代表華人利益發言。1914年2月，何啟退休後，劉鑄伯接任，成為第五位擔任定例局局員的華人。

劉鑄伯屬於出身、教育背景等較為傳統的華人議員，但在任內，對香港立法工作多所獻言。開會時一般都沉默寡言，但牽涉華人利益，則據理力爭，如1919年在局內審議把長洲山頂留作西人居住區的法案，劉鑄伯（連同何福）即慷慨陳詞，極力反對。²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改善華人子弟英語教學的提案。1916年，在一次定例局會議上，劉鑄伯促請政府關注華人學生的英語教學，以期提高英語教學的效用。港英政府採納了劉鑄伯的建議，于1917年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官立學校華人學生的英語教學問題，檢討是否裁減其他科目的教學時間，以增加英語科目教學時間。委員會同年8月提交的報告不主張改變學校課程，但提出：實施小班教學、改善校舍、提高教師薪金，將會改進現時情況，並且一個英語老師最多負責120名學生的英語教學。此外，委員會報告主張對官立學校學生實施身體檢查制度，這個建議于1918年付諸實施。³⁰

在香港早期政壇上，罕見華人身影。要想擠入殖民統治架構，施展才華，實非易事，因為統治者必須維護其既得利益，容不得政見異端存在於集團中。劉鑄伯充任潔淨局和定例局局員，

旭蘇、曹善允、周峻年、羅文錦、李樹芬、李子方和譚馬士。定例局中華人議員所占議席少，兼之工作方式方法、語言、個人性格等原因限制了他們作用的發揮。詳參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香港史新編》（上），頁81-86；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頁185-188。

²⁸（英）弗蘭克·韋爾什，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340。

²⁹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頁86。

³⁰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46-347; 並可參閱 Cheng T. C., "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up to 1941,"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1969), pp. 19-20; Stokes, John & Gwenneth,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1987), p. 84. (這份資料由香港皇仁書院副校長梁維信先生于2007年1月10日透過電子郵件提供予筆者，特此致謝！)

具有多重意義。從伍廷芳開始，華人領袖力圖擺脫當時政治生態中的“花瓶”形象，他們扮演的角色，預示華人直接參與香港管治事務的新時代的到來。

四、商界作為：改組華商公局為華商總會

現今執香港工商界牛耳的香港中華總商會，創會歷史超過百年，其前身可上溯到1900年創立的華商公局及於1913年由其改組而成的香港華商總會。在此改組過程中，劉鑄伯扮演關鍵角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受惠于內地富商的遷入以及國際貿易的發達，南北行公所等同業組織漸次建立，香港華人的主體地位意識逐步提升，華商的政治要求漸趨強烈，但是，這些組織僅限集聚同鄉或同業，解決彼此間商業貿易上的矛盾糾紛，無法代表整體華商的共同意願，更遑論在政治上的集體話語權。1881年，年納房地捐（即「差餉」）大戶20人中，華商17人，納稅總額99,110元；洋商3人，納稅總額21,032元，華商遙遙領先，連港督軒尼詩也承認：華人成為香港最大的地產主，掌握極大部分香港外國銀行發行的通貨，負擔90%以上的稅收。³¹建立統一的華商團體已經水到渠成。1896年1月，中華會館（Chung Wah Wui Koon）落成開幕，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華人商會。1899年2月，華商會所（The Chinese Club）成立。這兩個機構為團結華商作了一些工作，但其作用尚未達到理想。1900年春，馮華川、陳賡虞、何澤生等港商組建華商公局（The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是為當時香港規模最大的華商總機構，在香港華商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從現有資料來看，至遲在1902年，劉鑄伯即參加華商公局的活動。在4月18日全港華商舉行的歡送港英政府輔政司史超域·駱克（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赴山東威海衛履新大會上，他代表華商公局宣讀頌詞。³²11月24日，劉鑄伯被推舉為華商公局值

³¹ 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頁372。

³² 〈致送頌詞述略〉，《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2年4月21日。

理，³³自此，他進入公局領導層，得以名正言順地出席公局會議。值理的經歷，使他洞悉公局的致命弊端及其因由，為他今後改革局務打下基礎。

華商公局集聚華商範圍畢竟有限，並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經費拮据，入不敷出，舉步維艱；兼之在 1905 年風起雲湧的抵制美貨運動中備受港府、商人和其他社會人士的諸多責難和重重夾擊，聲望一落千丈，創新變革成為急務。1906 年 7 月 16 日，公局六十一次敘會上，副主席陳賡虞推舉劉鑄伯為主席，古輝山首先「和之，」出席敘會的其他十人「均舉手，以表同情。」³⁴但劉鑄伯不願擔任。在 7 月 21 日六十二次敘會上，劉鑄伯指出公局章程多有不合之處，值理制度弊病尤甚，即使由他出任主席亦難以挽救公局。³⁵參加敘會的知名華商胡海籌認為劉鑄伯所論「極為切當，」其為人「熱心公益，眾所素知，」古輝山更認為劉鑄伯「人望素孚，如肯當局主席，街坊、同人定必樂於歡迎。」³⁶經眾人勸說，並承諾今後定當同心協力維持和發展局務，劉鑄伯才同意出任主席一職。甫上任，他即修改章程，首重值理權責的厘定。新章程規定：值理負責處理公局的事務和銀項，公舉正、副主席；值理人由公局同人若干充當，由金山、故衣等二十八行商推舉；值理每兩年一任，期滿可再舉複任，如有缺出，其餘值理可擇人暫補，公局下期聚會時再定實；從值理中擇立分任值理，由主席選舉確定，以分辦各事，被選舉人不得推辭；值理等有權設立規條附章，經公局會議訂允後，局內人一律遵守；值理可以隨時籌款，以應經費之不敷；值理每月聚會及隨時聚會，稱為「平常聚會」，其餘所有別項聚會，稱為「額外聚會」。其次，公局的職責，在於「設法保護華人商務並各項利益」，「凡有關切於

³³ 〈華商公局聚會〉，《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2年11月25日。

³⁴ 《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六十一次敘會記錄，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1。

³⁵ 劉鑄伯在華商公局六十二次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1。

³⁶ 胡海籌、古輝山在華商公局六十二次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

華人之事，皆廣諮博采」；翻譯解釋本港律法條例之要者，使局人明白；設法持平解釋生意事務的爭執。第三，會員資格，凡華商行店及華人在香港有商務生理或屋宇物業者，均可加入，入局規銀為五元或以上，另每年捐費二元或以上；凡在公局初創時已捐銀五元或以上，則視為同人，無需再捐局銀；如欲入局，須先有局內一人倡舉，複有一人和舉，由值理當堂投籌，以得籌多少而定去取。³⁷這份新章程凸顯值理的中心作用，對公局職能作了較之前明晰得多的規定，放寬了會員資格及交納局銀數目，對提升公局的社會認同、擴增會員無疑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劉鑄伯任內，華商公局還做了不少具體工作，致力籌辦公益，如：呼籲全港居民配合政府調查，申訴擾民情況；派員登記居民人數；要求政府不要隨街搜煙，引致不便等，³⁸使華商公局的代表性日益增強。他極力改革並推行值理制，為日後成立的香港華商總會的組織架構的進一步完善作了寶貴的初步嘗試。

劉鑄伯任職主席半年，堅辭而去，副主席陳賡虞繼任，勉力維持公局各項事務。1912年，杯葛電車運動起，港府調解未果，邀請劉鑄伯與運動發起人談判，事件最終平息。經此一事，劉鑄伯的聲望驟隆。辛亥革命後，香港各種商會和公會如雨後春筍般冒起，林林總總，僅1912年即有香港增城總會、東莞商會、三水商會、順德商務局、鶴山商會、全港雞鴨行工商總會、番禺公所、華人審計師公會等成立，³⁹大有壓倒華商公局之勢；而華商公局不僅一直未獲政府註冊為法團，而且弊病暴露無遺，如「同人 不照納年捐，值理不照兩年為一任，」⁴⁰如再不改革，勵精圖治，恐難符合眾望。

1913年11月12日，華商公局舉行值理會議，公推劉鑄伯為正

³⁷ 〈丙午年六月十五日同人額外聚會議定增改章程〉，《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8月10日。

³⁸ 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頁19。

³⁹ 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頁28。

⁴⁰ 陳賡虞在華商公局九十五次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1。

主席，袁英山為副主席，正、副司庫各一人，局值理三人，投票選出幹事值理十四人，同時舉出中文、英文司理各一人。11月22日，新值理初次聚會，與上屆值理進行工作交接，這是華商公局最後一次會議，也標誌香港華商總會（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正式成立，劉鑄伯為首任主席。次年，副司庫周少岐詳述總會成立經過，曰：

原夫華商公局之設，為聯絡我在港華人商情，恪守居留地公法，以維持大局者也。數年來，風氣日開，各邑商會與各行商團陸續繼起，究竟難免散沙之誚，同人有見及此，聯合同志奮興，將公局整頓，戮力進行，於去年癸醜十月廿五日，由陳賡虞君交盤……。自接盤後，經將前時章程集眾修改妥善，並公決將華商公局名號改為華商總會。經改定後，行頭、商會、行店、公司、個人等踴躍入為本總會同人者固多，而尚未入者亦不少。現計進入基本金約有累百盈千之數，務望我華商幸勿觀望如故，正宜早日入會，以助進行。屈指進行至今，雖為日無多，而辦理成績亦覺規模就緒，氣象煥然。⁴¹

是次改組，劉鑄伯注意團結同人，顧全大局，對不同意見者持開放態度，表現令人讚賞。他在一次聚會中說：

今日請諸君到來敘會，有決定宗旨、整頓公局進行，以補前時所未辦到之事，藉此公局結一團體。初時原擬如此辦法，嗣因各有意見，以致不果，如日後倘或有生意見，盡可合群商量，調停解釋。若因生意見破壞大局，料各人意亦不想。⁴²

在組織制度建設上，他以1906年華商公局主席任內加強值理

⁴¹ 《香港華商總會癸丑年征信錄》（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4-1-81。

⁴² 劉鑄伯在華商總會九十九次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1。

事權為基礎，推選幹事值理，作為會中骨幹，推行會務，幹事值理制自此成為定制，直至1948年以理監事制替代。總會成立後，銳意發展會務，數年間，會員數量由百餘個增至千餘，各大公司、行號及行業商會均囊括其中。1920年12月，劉鑄伯、何福、羅長肇、李葆葵四人為代表，購入新會址。⁴³劉鑄伯對總會貢獻奇多，之後數度連任，迄至逝世，連續十年擔任主席，奠定華商總會的規模。作為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和資深的總會領袖，他的地位與聲望無人能望其項背，連周壽臣也尊稱他為「老前輩」。⁴⁴接任主席之職的李葆葵評價劉鑄伯時說：

劉君以華商公局為華僑領袖機關，非擴大之不足以提挈華僑、振興商務，於是發大願力，聯合同人，改組華商公局而成華商總會，自是而後，劉君致力會務，到底不懈，主席十年，為有會事鞠躬盡瘁之慨。……以今日本會成績之優美、名譽之隆大，下而至於局面之堂皇言之，弟意為非得到劉主席之提挈，未克臻此。⁴⁵

劉鑄伯兩度出任主席，均是臨危受命，雖然困難重重，但都能轉危為機，使這個組織的發展日益頑強茁壯。從擔任華商公局主席，改革值理制度、厘定公局職責、規定會員資格，到擔任華商總會主席，進行全面性的深刻改革，劉鑄伯為華商總會的進步傾注大量心血，得到華商的擁護，迅速扭轉了總會的惡劣聲譽，提升總會的社會知名度，擴展了總會的社會基礎。為了表彰劉鑄伯對華商總會的卓越貢獻，1933年4月，總會內豎立劉鑄伯銅像，以資永遠紀念。如果說華商總會是全港華商的精神家園，那麼，劉鑄伯毫無疑問地是這個家園的精神領袖。

⁴³ 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頁29-30。

⁴⁴ 周壽臣在華商總會1921年夏曆十一月十五日（即西曆1921年12月13日）值理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21-1923）》（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2。

⁴⁵ 李葆葵在華商總會1922年6月12日敘會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21-1923）》（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HKMS163-1-2。

五、培育英才：以育才學校為視角

教育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環節和關鍵性內容，起著傳承賡續、進步創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開埠前的香港，傳統的書塾教育（民間稱為「蔔蔔齋」）擔承主體角色。據統計，在清代的新界地區，共有五十多所較有規模的書塾，擔當著教書育人、承傳文明的職責。⁴⁶英人統治香港時代，書塾教育不僅未有式微，反而在港英政府的資助下穩定向前發展。但是，早期學生入學的功利性目的相當明顯；另一方面，社會不斷發展，物價持續攀升，教育普及和深入任重道遠，尤其是廣大的華人子弟，失學、失教、失育的情況普遍，這不能不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政府歷年來雖採取不少促進教育的措施，但總體進展強差人意，華人領袖有見及此，紛紛發起集資辦學，擔負提高教育普及的任務，以彌補官立學校及傳統書塾之缺憾。

劉鑄伯少年時艱苦自勵、堅持學習的經歷，讓他對提升香港華人子弟教育有著一份特殊的執著，終其一生，都在不遺餘力地推進華人子弟教育，包括創建孔聖會義學，推動東華醫院義學制度改革，在家鄉開設紀劬勞學校（詳下文）等，而成績斐然、令人側目的當屬倡建及主持育才書社。

育才書社（The Ellis Kadoorie Chinese School Society）由印度籍英商伊利士·嘉道理爵士（Sir Ellis Kadoorie, 1865-1922）創立，既是一個興學育才的團體，所設學校也以此命名。嘉道理熱心教育，除了個人捐出鉅資四萬元外，還廣邀全港知名紳商共同參與，合力推進；此外，還發起廣泛社會募捐，籌集辦學資金。因此，育才書社的組織規模頗為龐大，主席：伊利士·嘉道理；副主席：馮華川、周東生、何澤生等 10 人，司理：劉鑄伯；司庫：阮荔邨等 4 人；總理：招雨田、劉渭川等 85 人，囊括了當時知名華人，其中馮華川、何澤生、葉靄山、廖紫珊、劉鑄伯經過公舉，負責倡建書社。書社的主旨，在於按照西方模式為貧窮華人子弟

⁴⁶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香港史新編》（下冊），頁419-420。

提供充分的教育，同時也注重中文教學。⁴⁷

劉鑄伯身為倡建人兼司理人，雖然其他事務纏身，但書社事宜無分巨細，特別是牽涉到校舍、資金、生源、師資等關鍵事項，必親力親為，不曾稍有懈怠。首先，負責發佈勸捐、公佈捐項、招生、招聘教員等類廣告。勸捐事務自倡建之日起即開始進行，一直未有間斷。在1901年4月24日，書社發出勸捐廣告：

本書社為培育人才、廣開童智起見，特擬於本港及羊城諸處，擇便逐漸推廣，增創館舍，務便就傳，毋使跋涉之勞。延聘中外通儒，專課中、英文學，以期精益求精。荷蒙同志諸君子慨捐鉅款，現計惠助者六萬五千餘員。惟是經費浩繁，要須仍呼將伯，多得一分，即多做一分之事。伏念為善必有同心，總望大君子慷慨仗義，鼎力樂捐，助成美舉，是所厚望焉。除另刊章程派送外，理合布聞。如蒙惠捐，請交本書社管理銀項董事，立回收條，以杜假冒，實為公便管理本港及外埠捐款。⁴⁸

當書社允准在廣州開辦後，劉鑄伯再次倡議捐款：

本書社創辦中西義學，實為作育人才，揀時艱而開風氣起見。在殷富者，延師課子，易於成材；惟貧□之家，非無英俊，第已難謀俯蓄，奚暇籌及束修。是縱有可造之才，亦將庸碌以沒世，亦更慮聰明誤用，流為邪匪，貽害國家，以可為世用之人而反為世害，究心時局者，當共惜之。此本書社義學之設所由刻不容緩也。同人正議集款創辦，適西友嘉君導理亦深韙斯旨，不分畛域，慨然助以鉅資，而港中諸君子聲應氣求，又復同襄義舉，業經聯稟省大憲，呈請分設書社于省城河南等處，蒙批示准辦各在案。弟復于九月初三日約同馮君華川、嘉君導理赴省稟謁陶制憲，叨承獎飾，並蒙俯允為本書社粵省總主席，仰見

⁴⁷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 Opinion*, p. 336.

⁴⁸ 〈育才書社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4月24日。

大憲紆尊降貴、造士作人之至意。優渥逾恒，大雅扶輪，同深感戴。惟是本書社雖籌有鉅款，而港中已擇地開辦，計續辦省城河南兩處經費，恐屬未敷。前月謁見省城列位紳商，幸均荷樂為將伯。語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同人等鹹嘉賴之。惟願諸君子分攜綠簿，廣為勸捐，以成此善舉，他時辦有成效，進可為國家佐富強之治，退可為習俗化頑固之風，皆諸君子栽培後起，鼎力玉成之大德也。伏望見義勇為，裘成集腋，毋各惜慳。襄而罔懷大局，毋鄙夷同種而貽笑友邦，是則同人等所心儀而頂祝耳。⁴⁹

書社得到省港官紳和華商的鼎力支援，捐款數目相當可觀，據 1901 年公佈，共有款項 20 餘萬元。劉鑄伯按時刊登捐項情況，俾各捐款人及社會人士明瞭來往款項，不致瓜葛糾纏。⁵⁰

對書社生源，劉鑄伯謹慎處理，預先發出招生廣告：

本書社之華英學塾不日即行啟館。如有子弟有志入塾者，請將年貌、籍貫、住址並其父兄操何事業寫明，送至屈臣氏藥房弟處，先行掛號，以便啟館時采擇留堂，至開館日期，俟擇定後再行通知。⁵¹

書社中、英文並重，尤以英文科目為要，所以英文教員選聘至關緊要：

本書社欲聘請英文幫教習二位，每月修金先送三十員，如教有成效，陸續加。倘願就職者，請函交屈臣氏藥房弟手收為荷。⁵²

其次，參與書社選址，及時公佈進展情況。香港育才書社初

⁴⁹ 〈育才書社勸捐小引〉，《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11月13日。□內字為原文不能辨認。下文均同，不另注。

⁵⁰ 詳見〈育才書社告白〉（4則），《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12月9日、18日，1902年9月26日，1904年2月2日。

⁵¹ 〈育才書社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9月12日。

⁵² 〈育才書社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11月6日。

辦時校舍緊缺。1901年9月22日，劉鑄伯當選為中華會館總董之一，遂聯合其他總董與書社簽訂三十年租約，⁵³校舍緊張問題迎刃而解，育才書社得以順利開學：

本書社設在中華會館之華英學塾，茲擇定于英十月二號即華曆八月二十日晨早九點鐘啟館，已掛號諸生請於十九日早十點鐘到堂，候教習採納，及未掛號者亦望早日掛號，以免臨時額滿，不能收納是荷。⁵⁴

上海、廣州兩處書社的選址進展情況，劉鑄伯亦及時佈告周知。⁵⁵

最後，創新辦學模式，解決經費拮据之虞。書社為了免卻貧苦華人子弟就學，初期不收學費，就讀者眾多，趨之若鶩，卓有成績。隨後，問題便暴露出來，捐款難勸，經費籌措不易，帶來諸多掣肘；此外，學生以免費入學就讀，遲到、早退、曠課時有發生，甚至有中途輟學者，有違辦學初衷。為了根本解決這兩個問題，1904年3月開始，書社由免費改為收費，以期教學資源得以充分利用：

本書社自創設以來，數載於茲矣。溯創始之際，概不收學童修金，嗣因勸捐無多，書社之積項漸薄，加以開銷日繁，迫得興議，每學童每年收修金廿四元，聊資補助，竊勻計本，書社須費四十八元，方敷一學童之用，即使收回二十四元，亦僅敷半年之費項，不過藉此彌補，本書社較易支持而已。惟各學童初因不需修金，其心未免輕視，故時有曠學、作輟等弊，即告假限期，多無定咎，轉有負本書社作育人才之初心。茲再議由本年起，本書社香港學堂仍照舊章，每年每學童收修金廿四元，到明年底核計，如有學童到學堂上學足二百十五天者，即將所收該童生全年

⁵³ 〈中華會館聚會〉，《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9月23日。

⁵⁴ 〈育才書社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9月24日。

⁵⁵ 詳見〈育才書社告白〉（2則），《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年9月12日、12月9日。

修金如數奉還。及年試大考，每班得列首名者，亦將全年修金送還；得列二名者，將半年之修金送還，此外另有賞物，藉資鼓勵，俾各學童勤奮，免荒功課，及符本書社創辦人之初心，將來人才輩出，本書社有厚望焉。⁵⁶

由於生源定位準確，課程目標明確，書社的發展頗為順利，在香港設有兩間，上海一間，廣州三間。廣州育才書社的創立，先由劉鑄伯將開辦原委和章程稟請兩廣總督陶模，陶模「大為嘉許」，親自批示：

該紳等聯合同志捐集經費，擬在粵東省城河南及香港創設書舍三所，名為育才書社，招選聰穎少年肄習中英文學等情，查興學造士，實今日第一要□。惟和局初定，兩宮猶未回鑾，是以學校一事，國家雖有意振興，尚未暇廣為開辦。今該紳等為開通民智、裨益人才起見，集資數萬之多，竭志經營，成斯善舉，苦心毅力，深堪嘉尚。依利士·嘉道理以外國商人，久居中土，獨捐銀至四萬，尤為慷慨，性成不分畛域，本部堂不勝欣慰，應即准予立案，並俟省城河南兩書社擇定地址後，再行稟請。劄賜該地方官給予照料保護，其一切辦理情形，仍著隨時稟報察核。再閱所定規條章程既密，界限尤嚴，誠為毫無流弊，惟第一條專課中英文字及別有何課程可教者，由總理人擇善而從等語，查中西各學，門類繁多，斷非文字一門能盡其用，尚須明定課程，添課各種有用之學，分班肄習，幾材士輩出，上備國家任使，本部堂有厚望焉。⁵⁷

廣州河南龍洲設立主校，西關荔灣及德宣路粵秀街各設一間分校，要求入學者絡繹不絕。粵秀街分校於 1902 年 5 月 27 日招考學生，廣州府暨南海、番禺兩縣官紳齊集書社內命題考試，風頭

⁵⁶ 〈育才書社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4 年 2 月 25 日。

⁵⁷ 〈添課育才〉，《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 年 8 月 6 日。

一時無兩。⁵⁸

育才書社創設之時，香港華商實力大增，社會急遽發展；清朝在國內舉辦新政，銳意變革，兩地均急需各類專門人才，以應付日新月異的社會需求。育才書社開辦於省、港、滬三地，切合時需，成就頗為矚目。⁵⁹而劉鑄伯主掌司理，使教務進展順暢，井井有條，培育英才，為世稱道，堪為學界先鋒，實至名歸。

六、醫界推手：東華醫院主席與廣華醫院倡建總理

東華醫院之設立，明顯受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香港人口激增以及香港華人信賴中醫的傳統觀念的影響。持續了十多年的“廣東洪兵”起義，加速了華人湧入香港，華人數量從 1853 年的 39,017 人增加至 1866 年的 115,098 人，⁶⁰給香港社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就醫看病即是其中最大端者。當時香港的國家醫院（Civil Hospital，成立於 1849 年）不僅資源有限，應付不了眾多的病患者，最棘手的莫過於華人根本不相信西醫西藥，只信賴中醫中藥。生病的華人拒絕接受西醫治療，只有被運送到停放屍體的廣福義祠。病人與屍體同處，衛生環境汙穢不堪，影響周邊居民，加劇環境污染，華人怨聲載道。病人得不到有效醫治，有悖

⁵⁸ 〈書社肇開〉，《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2年5月29日。

⁵⁹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頁 231。另，關於廣州育才書社，參閱朱英和、沈瓊樓，〈清末廣州河南兩間私立學校——育才書社和南武公學〉，政協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第十輯（廣州：內部發行，1963），頁 76-84。香港的兩所育才書社，分別為位於西營盤的中文學校及銅鑼灣掃桿埔的印度兒童學校。1915 年，兩間育才書社由政府接辦，改為小學，西人畢特（R. E. D. Bird，生卒年不詳）擔任校長。上海育才書社位於公共租界，1901 年創建，1912 年更名為育才公學（The Ellis Kadoori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1945 年，改名為上海市立育才中學（詳參上海市育才中學網站，地址：<http://wsl.yucaish.cn/pages/second.aspx?sort=2> 以及 <http://wsl.yucaish.cn/pages/second.aspx?sort=67>。查閱時間：2010年9月20日）。此外，亦可參閱段力佩，〈育才中學的歷程〉，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九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253-259；嚴雋培，〈上海工部局設立的育才公學〉，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教科文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276-282。

⁶⁰ 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頁 339。

於人道精神，對港府的醫療政策和環境衛生政策亦構成巨大挑戰，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港府與華人領袖商議解決辦法，方案便是興建東華醫院。

在港英政府的推動及支持下，1869年5月，華商集資籌建東華醫院，1870年奠基，1872年建成，是當時華人在港興辦的最大的社會福利機構，⁶¹「不僅為病人養病而設，特一慈善公益機關，故港政府夙所倚任，亦我華人眾口一聲，所稱為最大公益局所者也；」⁶²東華醫院同時扮演華人與政府對話的角色，起著溝通橋樑、爭取權益的作用，因而在華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港府亦要另眼相看。醫院的運營經費自籌自給，如此一來，醫院主席、總理理所當然地由出錢最多、出力最勤的華商領袖擔任。總理一般設有六至十二人，負責處理醫院的日常事務。1899年，盧冠廷任醫院主席，劉鑄伯等九人任總理。三四月間，疫症流行，主席及總理齊心協力，於四月十四日（西曆5月23日）開辦“東華醫院西環分局”，收容傳染病人，以中藥治療。為使患者周知，廣發傳單，云：

港中時疫，日有數起。本院已在西環開辦分局，專以華醫華藥調治病人。如有染此病者，切勿隱匿不報，致違憲諭。倘來院報明，則聽病者自主，其自願往分局醫治，抑或雇船返鄉，本院均可發給憑據，即可放行，並無阻留。若果救治不及，染症身亡，來院報明，亦可代雇船隻，運柩返鄉，並無阻撓。至於搜查房舍，不過欲求潔淨，以免傳染，此乃政府愛民至意，並非驚撓，祈勿別生疑慮。⁶³

從傳單中，可以看出西環分局對來就醫患者或醫治或返鄉，死者

⁶¹ 有關東華醫院之創立情形，多數中外香港史著作均有論及。前揭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一書已成為該領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詳參該書pp. 30-81。另，前揭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一書亦述之甚詳，參閱該書頁30-98。

⁶² 賴連三，李龍潛點校，《香港紀略（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36。

⁶³ 轉引自《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頁8。

返鄉等均有適合措施，足見東華的工作十分細緻周密。

1906年，劉鑄伯已然卓立於香港華人社會，備受仰重，而此時的東華醫院也是港英政府與華人社會溝通的重要管道。1905年12月30日，華民政務司致函東華醫院，召集全港華商代表商議將醫院贈醫處改作「女棲地方」，信云：

日昨督憲親臨保良分局，體察局內一切情形，深羨辦理妥善。惟所有留居難女，良歹不齊，倘任其同居共處，恐彼此互相師效，習染更深。惜局中房舍無多，勢不能將頑愚之婦女另安置一所，且女棲地方，究竟湫隘，終日幽閉，此中別無舒散之處，未免有致病之由，在辦事者定費躊躇矣。再四思維，獨有貴院贈醫處一所，與局毗鄰，倘可將該處讓出，展拓局地，庶不致有種種煩難，且更能將局後新院相通之路並歸彼處同用，愈覺合宜。以上各節皆督憲所劃之策也。經特委本司與貴院同人會商，以定可否。忖思退讓醫院物業，事體重大，不欲列位當年總理獨專□任，故於本月二十八日邀集下列各紳董貴署聚會，宣明督憲之美意。旋蒙列紳答應，均謂盡可辦理得到，但仍須取決於當年總理等語。茲將是日會商情節布達左右，並請貴院邀齊各位紳董，再為酌議，決定從違，據實函知本司，以便轉詳督憲察核。⁶⁴

獲邀參加十二月二十八日（西曆1906年1月22日）聚會的華商15人及其身份如下：梁培之（未到，1904年東華醫院主席）、古輝山（未到，1895年東華醫院主席）、阮荔邨（未到，1900年東華醫院主席）、陳紫垣（未到，1901年東華醫院主席）、鄧蘭毅（1904年保良局總理）、周少岐（1903年東華醫院主席）、劉鑄伯（1899年東華醫院總理）、盧冠廷（1899年東華醫院主席）、胡海籌、葉靄山（華商公局值理）、何曉生（即何東，1898年東華醫院主席）、李右泉（華商公局值理）、劉蔭泉（華商公局值理）、何

⁶⁴ 〈東華醫院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年1月4日。

澤生（華商公局值理）、潘寅存（華商公局值理）、陳賡如（即陳賡虞，1905 年署理華商公局主席），到場的還有兩位定例局局員何啟和韋玉。這份信函和名單，表明東華醫院的重要地位以及華商代表的廣泛認受性。

1909 年（農曆己酉年），劉鑄伯當選為東華醫院主席，任內積極拓展院務，興建物業，募款賑災，改革東華義學規制。

東華醫院創立伊始，即兼負收容救濟滯港難民之責，但難民與病人同處院內，彼此均感不便。劉鑄伯決定在醫院右方醫院道興建棲流所，專以安置難民。1910 年，獲得政府批准興建，數月而成，使難民與病人分離，並設專人管理，彼此安然。棲流所服務難民、災民及老弱殘廢者凡五十年，1960 年撤銷。

1908 年冼德芳主席任內，倡議將保良新街民房拆卸，改建痘局，以解決傳染病人與普通病人雜處的問題。1909 年，主席劉鑄伯召開董事局會議，議決除興建新街疫局及西環東華痘局外，計畫籌建九龍油麻地痘局。當年 7 月發動募捐，集款達六萬四千餘元，其中有日本商人捐助三千一百元，聲明撥歸東華醫院公款。同年 8 月，新街痘局（即仁恩病房）竣工，西環堅尼地城分局改建，亦於翌年完成開幕，定名東華痘局。

1909 年冬，廣東廣肇各屬遭遇洪水之患，劉鑄伯以近來捐賑頻仍，且年近歲晚，不宜在港勸捐。經過會議，決定去函省港澳合辦的救災公所，以廣肇水災捐款項下，撥款江北賑災。

1910 年 4 月，廣東全省發生旱災，顆粒無收，新安、東莞尤為嚴重。劉鑄伯當即籌辦平糶及散賑工作，並籲請各界支持，籌款二十餘萬元，與廣州廣仁善堂合作，在各州府舉行平糶（即用捐款收購糧食，再以平價賣出），⁶⁵對救災賑濟起了積極作用。

東華醫院創立義學，始於 1880 年開設的第一間文武廟義學，以後續有擴張，至 1903 年，已達八間，眾多貧苦子弟受惠深廣。為了防止學位被成績差劣的學生佔用，1907 年，規定學生留校年

---

⁶⁵ 本文關於劉鑄伯在東華醫院主席任內之作為，大多取材於《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頁 11、91-92、207、231、299-300。

限，以五年為期，自入學之日起計算；在校學生年齡不能超過十五歲，否則退學。劉鑄伯認為，兩者互相矛盾，與實際情形不合，因為就讀義學的貧苦子弟入學時已經超齡，學習期限未滿即年屆十五歲，不得不退學，未能接受充分的教育，這違背了舉辦義學的初衷。有鑒於此，劉鑄伯任內宣佈：在學學童，無論成績高下，不用抽籤，均可留校；留校年期，由入學之日起計，以五年為限，到期則飭令退學。⁶⁶這兩項改革既切合實情，也不違反政府則例，貧苦子弟尤為受益，從此，無論年齡、成績，他們均可入學就讀，較為充分地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大大打擴展了教育對象的範圍。

1898年，新界劃為香港屬地，人多地袤，缺乏醫院。港島與九龍的華人領袖於是商議籌建華人醫院。關於此點，1911年的征信錄述之甚詳：

油麻地居香港之背，相隔一水，其地為新安土股之極端，居民繁庶，不亞於香港，而是地向無醫院，其有疾病，皆來港就醫。時或疾風暴雨，驚濤駭浪，欲濟無舟，嚴寒酷暑，中途阻滯者，不知凡幾。故創院總理，均以是地醫院之設置，較之港埠，尤刻不容緩。⁶⁷

1907年，港九華人領袖何啟、韋寶珊、劉鑄伯、馮華川、鄧志昂、李右泉、陳啟明、黃麗川、李鳳珊、周少歧、潘寅存、何萼樓、周熾卿、何甘棠、古輝山、唐麗泉、招頌侯、胡海籌等倡建廣華醫院，何啟任倡建主席，其餘為倡建總理⁶⁸。此外尚有各界人士及各行商號支持計畫，出任倡建協理、倡建值理。院址選在油麻地，定名廣華醫院，與東華醫院相呼應，意為「廣東華人醫

⁶⁶ 東華三院教育史略編纂委員會，《東華三院教育史略》（香港：東華三院壬寅年董事局出版，1963），頁45、46。

⁶⁷ 〈創建九龍廣華醫院崖略〉，轉引自《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頁21。

⁶⁸ 近年研究顯示，興建廣華醫院計畫最初是港英政府於1906年主動提出，華商（主要是主持東華醫院的華人領袖）被動接受；1907年，廣華醫院計畫已經取得重大進展。詳參丁新豹書，頁163、168-172。

院」。港府撥給三萬元，不足之數均由官紳捐助。1911年10月9日，醫院落成，起著與東華醫院同樣的社會功能，使九龍、新界民眾可以就近享受優質的醫療服務。1931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合組成東華三院，規模大增，設施臻善，服務日廣，為香港衛生醫療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眾所周知，香港屬於亞熱帶氣候，溫暖潮濕，容易滋生各類病毒，自然條件註定香港的醫療衛生時刻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香港開埠後，人口與日俱增，中外交流日漸頻繁，給衛生環境的複雜變化帶來很多的不利因素。在政府衛生資源不足、華人只信中醫不信西醫的傳統觀念作祟的特定情勢下，華人領袖組建醫院，自籌自支，自主管理，擴展醫院功能的多樣化、大眾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決華人對於醫療權利的迫切需求，而且表明華人參與香港公共事務管理、發揚自治精神的自覺自為意識的提高。居間主事的華人領袖發揮推手作用，不斷促進香港醫療衛生事業向前邁進，夯實華人主體地位，其功厥偉，後世不忘。

七、家鄉情結：建設平湖新墟

劉鑄伯家鄉平湖鄉位於新安縣北部，與東莞縣接界。由於偏居內陸，交通不便，經濟民生有欠發展。劉鑄伯雖在香港功成名就，但家鄉的落後狀況讓他魂牽夢繞，未曾稍有忘懷。這種人類特有的家鄉情結，在劉鑄伯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獨資建設平湖新墟。

平湖新墟作為一個整體的基礎性項目，最先建設的是廣九鐵路平湖火車站。廣九鐵路連接九龍和廣州，途徑新安、東莞，在四地交通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⁶⁹鐵路是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對經濟民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已為現實所證明。廣九鐵路最初設計的行經線路遠離平湖，劉鑄伯意識到這是促進平湖發展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如果錯過了，平湖的發展將大為落後，所以，他力排

---

⁶⁹ 關於廣九鐵路修建的來龍去脈，可參閱楊耀林，《深圳近代簡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90-93。

眾議，據理力爭，最終促使廣九鐵路修改路線，在平湖設站，劉鑄伯負責出資修建。1911年10月，廣九鐵路全線通車，平湖站建成為廣九鐵路深圳段五個車站之一（其餘四個車站為李朗、布吉、深圳墟、深圳），「鄉人稱便，而路亦不紆，」⁷⁰極大提升了平湖的交通運輸能量，平湖成為新安、惠陽、東莞三地交接處的交通樞紐，地位與作用驟然提升。

劉鑄伯以鐵路為依託，在平湖火車站附近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工程，建造新墟鎮。他親任設計師，完成新墟的設計。新墟成「田」字型格局，設有上、下六條街道，其中的守真街，向北延伸一公里，至青奇坑劉家花園「守真園。」⁷¹1916年，新墟建設基本完工。從「平湖人民公社老圩鎮房屋四至圖」不難看出，新墟規模龐大，店鋪鱗次櫛比，街道寬闊規整。在此後歲月裏，新墟歷經時代風雲的洗禮，至今仍存基幹部分，當年風貌，依稀可見，依然發揮相當大的商業、物流中心作用。新墟建設涉及眾多具體項目，特別值得一提的，當屬念婦賢醫院、紀劬勞學校以及開設商場。

念婦賢醫院位於新墟的西南面，毗鄰火車站，取名「念婦賢」，乃是劉鑄伯感念原配夫人潘氏之賢孝兼及心系家鄉鄉民之疾苦。開業之初，聘請醫生四、五人坐診，鄉民反映醫院只看病不留醫，略嫌美中不足，於是劉鑄伯在醫院側面增建「周馬氏留醫所」，從香港請回西醫，負責門診及住院事宜。醫院後來續有增建和改建，中醫、西醫兼有，門診、住院俱備，婦科、產科齊全，為平湖及附近鄉民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成為民國時期寶安縣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備的醫療機構，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仍然肩負著平湖地區中心醫院的重責。念婦賢醫院的創設，不僅鄉民受惠無算，交口稱讚，而且受到各級政府的褒獎。署理寶安縣知事兼員警事務所所長周德馨於1916年12月29日「出示保

⁷⁰ 劉富宗等，〈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頁6，下。

⁷¹ 關於守真園，參閱前揭彭全民，〈愛國港胞劉鑄伯及其評論〉，頁57-59；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205-207；劉仲德，〈守真園話今昔〉，《劫後集》（未出版），頁77-80。

護」，文曰：

疾病扶持，講明親睦；倡隨眷念，拯濟幽憂。就暖支羸，望閭閻而知疾苦；針育起廢，懷鄉裏而溥仁施。念婦賢醫院者，系邑紳劉鑄伯所經營，為元配潘夫人而創建者也。玄霜空搗，絳雪難求；獼髓虛傳，蜨魂不返。柿葉寫悼亡之句，杏林開治病之門。知營齋營奠之虛，惜金錢之浪擲；悉調陰調陽之妙，教針石之兼施。鳳樓之仙侶，空懷龍府之神方宛在。悵幽明之永隔，痛切針茅；憐貧病之相連，情殷饋藥醫。曾折臂代延治疾之國，工院可棲身，不減庇寒之廣廈。列竈各分，煮藥塞門，而老幼沾仁；救災尤重，恤憐行道，而幽冥資福。禮羅扁鵲，豈徒為帶下之醫；誼篤梁鴻，終未忘眉齊之案。切脈而沉肩並起，比肩而淑德同稱。惠瀉青囊，美彰彤管，比似棠陰芾，舍期翦伐之；休加共看，藥院苔紋，願維持於不蔽。本知事特為示諭，爾民人其各凜遵。⁷²

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於1916年12月24日發佈第七三號佈告，曰：

劉紳鑄伯，獨自捐資于寶安縣平湖鄉，創立念婦賢醫院，原為醫理貧病鄉人而設，不特惠爾鄉人不少，並可助政府舉辦地方公益之進行，自應合力維持，俾垂久遠，合行佈告，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該醫院為憐恤貧病鄉人之所，事屬公益，保護宜周，倘有騷擾情弊，定必查拿重辦，決不寬貸，其各凜遵毋違。⁷³

大總統黎元洪有感及此，於1915年10月親書「樂善好施」四字贈予劉鑄伯，以中央政府名義高度肯定了劉鑄伯在家鄉推行公益的善舉。⁷⁴

⁷² 此示之陰刻青麻石碑鑲嵌於醫院內牆。

⁷³ 此佈告之陰刻青麻石碑鑲嵌於醫院內牆。

⁷⁴ 此四字陽刻於醫院正門上方。

紀劬勞學校位於新墟的東南面，設有一座二層的教學樓、操場和廚房。取名「紀劬勞」，寓意劉鑄伯對母親無私奉獻的母愛的感念兼及對家鄉學子的關愛。學校在改進平湖及整個寶安地區、惠州、東莞等地教育條件起到積極作用，也吸引香港的學生慕名而來就讀，在近代深圳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仍然作為平湖地區唯一一所中學校舍。紀劬勞學校的創立，功莫大焉，同樣得到各級政府的首肯。周德馨於1916年12月29日「出示保護」，文曰：

教善分財，古風未泯；訓勞誠逸，母範堪欽。賢俊揚名，常秉荻書之訓；教思錫類，永推鞠育之恩。平湖紀劬勞學校，為邑紳劉君鶴齡所經營，表其母伍太夫人之慈惠。念童年之樹立，由母道之裁成。以四民失學之堪憂，仿兩等分班而設教，有蒿目時艱之慨，知教育之當興；誦棘心聖善之詩，悵劬勞之未報。集苞杞而思將母，歌棧樸而慕作人。學修期蛾術之勤，校舍築蠹房之密。禮隆釋菜，書讀燃藜。凡時雨之滋培，悉春暉之煦育。溯母儀於蘋藻，胥成芹藻之香；興才俊於菁莪，無廢蓼莪之什。緬善則稱親之舉，當推孝子為師；識食而不教為偏，絕勝眾人之母。從此樹護堂舍，定知愛護而無憂；願教敬梓鄉閭，共切瞻依而永保。本知事特為示諭，爾民人其各凜遵。⁷⁵

朱慶瀾於1916年12月24日發佈第七三號布告，曰：

劉紳鑄伯，獨自捐資于寶安縣平湖鄉，創立紀劬勞學校，原為不忘母氏劬勞，啟迪後人智慧而設。劉紳之孝思不匱，即鄉人之受益無窮。凡屬鄉人，自應體念劉紳之熱誠，保茲學校於勿替，合行布告，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此校原為教育鄉人而設，務宜合力保護，俾垂久遠。

⁷⁵ 此示之陰刻青麻石碑鑲嵌於醫院外牆。

倘敢肆行騷擾，定當重懲不貸，其各凜遵勿違。⁷⁶

黎元洪也不遑多讓，於 1915 年 10 月親書「急公好義」四字贈予劉鑄伯，以表彰他在家鄉興學育才的善舉。⁷⁷

廣東督軍陸榮廷對於劉鑄伯「情關故里」、「熱心公益」，創設學校、醫院的善心和行動極為感佩，於 1916 年 11 月 17 日發布第二十七號布告，曰：

據劉紳鑄伯函稱：竊以敝鄉平湖村居僻壤，風氣固塞，學務不興，地復瘠貧，人多失學，處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時代，以智識不開之貧民，夫將何以自立？僕情關故里，言念之下，用是矜憐，爰解私囊，倡辦小學堂一所，名曰紀劬勞學校，一則藉以教育貧民，俾資自立；一則念家慈撫養教育之勞，底僕于成，乃有今日，爰命是名，以留紀念，永志不諼。復以敝鄉村人貧苦，若遇疾病，苦無良醫，為之調理，並婦人生產，亦無練習接生，以致夭折甚多，殊乖天道，故復獨自捐貲，建設醫院一所，名曰念婦賢醫院，一則拯鄉人之疾苦，一則念故室內助之賢，亦以示不忘之意。刻下小學堂及醫院兩處興工構築以來，數月於茲，工程均將告竣，開幕在即，用特肅函，敬請鈞座，給予憲示，俾資保護而興觀感，異時學風丕振，壽域宏開，無一非憑福曜所賜也。等情前來。查該紳獨力捐資，在平湖鄉倡設學校、醫院各一所，具見熱心公益，殊堪敬佩，所請出示保護，自可照準，合行布告，仰該鄉各界人等知悉。爾等須知設立學校、醫院，系為嘉惠貧民、拯救疾苦起見，務各勸勉維持，以成善舉，毋得藉端阻撓。⁷⁸

1911 年，因應廣九鐵路即將通車，劉鑄伯牽頭招集資金，在平湖火車站開辦商場。關於這個設想的由來、經過、好處及難處，劉

⁷⁶ 此布告之陰刻青麻石碑鑲嵌於醫院外牆。

⁷⁷ 此四字陽刻於醫院正門上方。

⁷⁸ 此布告之陰刻青麻石碑鑲嵌於學校及醫院之牆壁。

鑄伯在給廣東勸業道的開辦報告中所述頗詳：

竊商等招集資本，擬在新安縣屬平湖鄉附近，於廣九鐵路車站之處創設一有限公司，建立商場，經營種種生意，並及種植果木。推原此舉，實為近處土人與資本家兩有裨益，且可藉以開通民智，使地方人民多得一謀生之路。有此商場而車站異常興旺，並可預定。茲將所擬章程及擇定地段界至，繪成形圖，一併呈覽。圖內各地，有已經買售者，有未經買售者，均詳細錄明。其未經買售之地，現正與土人議價，不日便可陸續交易清楚。懇援照公司商例准予註冊立案，將來房舍成立、商店開設，尚祈准給憑照，出示保護。

勸業道非常支持，上報督院，並在處理意見中說：

建設商場，為地方暢商務，即為貧民廣生計。新安縣屬平湖鄉附近廣九鐵路車站轉瞬車路通行，輻輳往來，自臻繁盛。該公司擬在該處地方擇地開闢商場，經營種種生理，並及種植，洵屬至計。公司總董劉鶴齡向在香港經商辦事，素具熱心，尤稱殷實。察閱所繳章程、圖式，開載辦法，尚屬詳明。章程內間有與公司定章不甚符合，現已核飭修改，一面由道先准立案，遴派委員，准補仁化縣知縣沈慶林前往，會同新安縣查勘，並行縣妥為保護。仍飭俟股份招足，再由公司遵照註冊定章，連同修正章程及備具註冊公費稟道，詳諮註冊，給發憑照，俾示維持。除批揭示，並俟縣委勘復，再將章程、圖式另行呈核外，所有劉商鶴齡擬在新安縣屬平湖鄉建設商場核明辦理緣由，理合先行詳報憲台查核。

督院亦樂於支持，於9月3日批復曰：

詳悉劉鶴齡等集資創設公司，擬在新安縣屬平湖鄉附近廣九鐵路車站地方開闢商場，既據章程、圖式稟經該道，核

飭修改，並派員會縣查勘，仰俟勘復到日，另行呈核，仍先飭縣隨時妥為保護，暨飭該商董等俟股份招足，即遵章備繳註冊公費，連同修正章程、圖式，稟道詳候核諮。⁷⁹

由於筆者未能進一步接觸關於開設商場的更多資料，所以商場最終是否開辦，具體情形若何，等等，不得而知，但故勿論成功與否，劉鑄伯的初衷是兼顧鄉民與己身的利益，開通民智，推動地方實業發展，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也是值得稱道的。

鴉片戰爭以還，清政府被迫陸續開放多處通商口岸（即「條約口岸」），喪失越來越多的權益。為了捍衛國家主權，清政府主動開闢口岸，稱為「自開商埠」（ports opened voluntarily by China）。據學者統計，從 1898 年至清朝覆亡，自開商埠達 35 處，廣東香洲位列其中。⁸⁰ 1908 年底，即有提議開辟香洲為商埠。1909 年 2 月，僑商伍於政與澳門商人王詵等奏請設立香洲商埠，並於 4 月 22 日正式開埠。至 1910 年，香洲商埠店鋪達到 1,600 餘間；8 月，一場大火燒毀部分店鋪，其餘繼續營業。1911 年 5 月，香洲商埠確定為無稅口岸，但未實質性地執行過無稅政策。⁸¹ 自開商埠雖有體制內的天生局限性及諸多後天條件制約，但其積極意義亦應充分考慮及肯定，香洲商埠就被視為珠海歷史上「第一次辦特區。」⁸² 與以上所述不同，平湖新墟是劉鑄伯倚仗廣九鐵路的興建而主動獨力投資建設的，官方資本不曾介入；平湖新墟既非條約口岸，亦非自開商埠，港英及廣東政府當局雖大力支持，但甚少干涉。這就避免了體制內的諸多限制，劉鑄伯得以利用其廣泛的人脈關係，發揮其長袖善舞的商場本領，建成規模宏

⁷⁹ 以上三段引文均見〈督院張批東勸業道詳平湖振興公司總董劉鶴齡等擬在平湖鄉建設商場緣由文（附件一）〉，《兩廣官報》14，收錄自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五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頁2512-2514。

⁸⁰ 楊天宏，〈清季自開商埠的地域分布與外貿場域的拓展〉，氏著，《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312。

⁸¹ 王傑、韓明章，〈官督之殤與商辦之傷——論清末香洲商埠衰落之因由〉，《學術研究》2012:10（廣州，2012.10），頁98-106。

⁸² 珠海市檔案館、珠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珠海歷史回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頁22。

盛、作用重大的平湖新墟。

平湖新墟的項目除了火車站、醫院、學校、商場外，還包括昌裕公司（後改名為益民公司）、大新織布廠（毀於抗戰時期）、車站倉庫（即九排倉）等，集經貿、工業、教育、文化、衛生、交通等近代化事業之大成。劉鑄伯對家鄉建設傾注心力，緣於落葉歸根的中國傳統觀念。境（海）外華人無論身居何處，無論身分、職業，總會情系家鄉、心懷桑梓，時刻關心家鄉建設和發展，這種家鄉情愫古今皆然。深港同源、同文、同俗，原為一體，近代時期香港被割讓之後，與深圳一河之隔，不論和平年代抑或動盪歲月，兩地交流合作從未間斷。劉鑄伯投資建設平湖新墟，無疑是深港交流合作的明證，是香港華商首次投資深圳的成功案例，推進深圳近代化事業的發展，不僅在當時產生深刻影響，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平湖新墟無論整體佈局還是內在細節，建築形式還是實質功能，多有可圈可點之處，堪稱近代深圳城市建設的典範，奠定平湖作為中心城鎮的基礎，為平湖的發展插上一雙堅強有力的翅膀。劉鑄伯後人謂：「吾國無市政，先考乃請於省吏，小試於其鄉，創市場、設學校、立工廠、建醫院，附以農林實業，規模粗具，於時人所稱模範村者，庶幾近之。」⁸³筆者以此實為至論。

八、劉鑄伯個案研究的意義：正面抑或反面？

香港開埠後，逐漸由傳統向現代蛻變，中西、新舊彙聚滲透，不僅成為「東西方之間、在中國沿海與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在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開展廣泛活動的基地」，世代居住在古老村落和漁村的人們也竭力維護其固有生活方式。⁸⁴這種亦中亦西、新舊交纏的過渡時代殖民地社會特徵，必然孕育出階層成分多元複雜、各種利益關係錯綜糾葛的社會格局。居於統治地位的英人不足總人口的1%，華人始終佔據95%以上，這些為華人領袖的脫穎

⁸³ 劉富宗等，〈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頁7，上。

⁸⁴ 王賡武，〈序〉，《香港史新編》（上），頁1。

而出提供廣闊的人脈網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國內動亂頻仍，逃港避難者紛至沓來，華人數量及富商大賈不斷上升，華人實力大為提升，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維權呼聲日益高漲，這無疑又為華人領袖的出類拔萃提供經濟根基。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吸納四海，在中西交流中長袖善舞，這為華人領袖的世界視野提供無與倫比的空間環境。但是，在既定的統治秩序中，華人領袖只能按照遊戲規則便宜行事，創新與進步需以空間的轉換、時間的前移為代價；兼且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人脈圈子的與眾不同，也限制他們才華的施展。正因為如此，他們之行事舉動往往遭受詬病，早年中央書院的華人畢業生，就有此種際遇：

很遺憾的，最近有一位人士告訴我：那些沒有兒子在中央書院就讀的中國人，對該校存有極大的不滿。他們認為那些學生，只會裝腔作勢，自以為高人一等，設立會所而不容許不懂英語的學生加入；那裏各種狂莽的事情都有發生。他們並未有如我們所期望的，將光陰和精力作正當運用，以光校譽。⁸⁵

從本質上看，這是一種由於教育背景差異而導致的處世價值的不同。事實上，很多早期的香港官立學校畢業學生憑藉自身優勢，在華人與西人、中國與英國、政府與民間、香港與廣東、不同階層以及社團等的特殊生態環境中，調適、折中、化解矛盾衝突，以期求同存異，推動進步。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況下，其作為難免時有兩邊甚至多邊不討好，有的被理解支持，有的遭到質疑誤會，有的遭到辱罵唾棄，這充分反映出香港社會矛盾和訴求的多樣複雜、詭異頻變，同時也說明華人領袖處於諸多不同政治勢力及利益團體的夾縫中的迷思。劉鑄伯就是這麼一個人，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社會的矛盾紛爭在他身上顯得尤為清晰深刻。

---

⁸⁵ Cheng T. C.,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 113, 轉引自《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168。

1919年3月，孔聖會要求東華醫院將文武廟所屬的閒置空地撥與該會興建會所、義校及運動場，東華醫院董事局對此事存有重大分歧，於5月10日召集街坊會議，商討定案。孔聖會會長兼東華醫院顧問劉鑄伯，起初主張空地由孔聖會發展。街坊會議上，歧見雙方的交鋒異常激烈尖銳，劉鑄伯深明大義地指出：閒置空地應該興建義學，解決貧者讀書不易的問題，而誰來興建義學，則「無關重要」。最後由東華醫院永遠顧問兼孔聖會創辦人之一的李葆葵一錘定音，再經眾人表決，東華醫院繼續使用該塊空地。校舍落成後，孔聖會要求租賃，作為辦學場所，被東華醫院婉拒。之後孔聖會要求租借校內大堂為辦公之用，東華醫院只得答應。⁸⁶

孔聖會與東華醫院同為當時深具影響力的民間組織，舉辦義學成績世所公認，為何斤斤計較於這塊空地，生出爭端，且非分出勝負不可？內裏原因，今已不得知。但雙方的較量博弈，為今人瞭解當時的社會矛盾狀況提供一個例證。這個例證絕非孤證，時人眼中的劉鑄伯充滿矛盾對立，對其評價迥然相異。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劉鑄伯是「英國人的走狗，毫無聲望；」⁸⁷而在廣東省長朱慶瀾看來，劉鑄伯「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國文明力圖進步，為當時開風氣，為人類造幸福。生平于振興商業外，如興學校、設醫院、救災濟貧等事，罔不慘澹經營，踴躍從事。其進取之勇敢，固令人驚歎，而愛國之熱忱，尤人所難及。」⁸⁸觀點對立之涇渭分明，以至於此！揆諸史實，環境、語境、角度、地位等因素極易左右評價的角度視闕。今人在回顧這些史事時，應著重省思切入角度，尤其注意講者當時的心境、語境與環境。人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具有多維度的不同面相，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因此，愚意以為，必須擺脫非此即彼、絕對正反（負）的思維定勢和評價框架，在具體分析人物言行的基礎上，

⁸⁶ 《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頁121-124；《東華三院教育史略》，頁47-49。

⁸⁷ 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收錄自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八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頁686。

⁸⁸ 〈平湖醫院學校開幕紀事〉，《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7年1月3日，第一張第二頁。

把握其主流方向，形成總體宏觀的功過評價。惟其如此，評價歷史人物方可準確拿捏、客觀可信，經得起時間檢驗，歷史人物才能呈現有血有肉有骨頭的豐滿而自然的形象。

劉鑄伯病逝前幾個月，時局轉趨多事。一邊廂是「妹仔」存廢的激烈論辯，另邊廂是海員罷工的曠日持久。劉鑄伯既要出席「妹仔」存廢問題會議，⁸⁹又要代表港英政府，遊弋於廣東政府與海員工人之間，斡旋調解。⁹⁰「妹仔」問題在劉鑄伯生前得到初步解決，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於 1922 年 4 月 14 日宣佈禁止養婢告示，指出「婢女非主人所私有。凡來港婢女，其欲離去主家，並已及自能決斷年歲，必須任其往求華民政務司，為之處理。……為主人、主婦者，凡其婢女如欲往見華民政務司，毋得阻止。」⁹¹調解海員罷工初時實心盡力，以「不可畏首畏尾，尤不畏人今日話殺、明日話割，不肯出來辦事。個人出來辦公益，殺只管任人殺，只問良心，兼就正來做便是」⁹²勉人及自勉，但是，調解過程困難重重，各方利益瓜葛糾纏，關係千絲萬縷，作為港英政府代表，因為「眾情不諒，疑謗交集」⁹³而落得一身罵名。劉鑄伯對此感到無可奈何，身心疲累，1922 年 5 月 1 日出席何甘棠榮休茶會上的一席話可作最佳注腳：

⁸⁹ 參見〈養婢問題之大辯論〉，《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1 年 8 月 1 日，第一張第三頁。

⁹⁰ 〈海員罷工風潮廿二志〉，《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2 年 2 月 18 日，第一張第三頁。

⁹¹ 〈華民政務司禁止養婢之告示〉，《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2 年 4 月 15 日，第一張第三頁。「妹仔」（Mui Tsai），簡而言之，即奴婢，廣泛而持久地存在于富貴華人家庭中。「妹仔」問題或「妹仔」制度相當複雜，其存廢歷經頗長時間，詳參 Lt-Comdr. & Mrs. H. L. Hanslewood,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the Mui Tsai System* (London: the Sheldon Press, 1930)，相關討論亦可參閱華若璧，〈妻子、妾侍、婢女：1900-1940 年香港的奴僕與親屬關係〉，收錄自華琛、華若璧著，張婉麗、盛思維譯，廖迪生編輯顧問，《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37-158。

⁹² 1922 年 2 月 9 日劉鑄伯在華商總會會議上的發言，《華商公局志事錄（1921-1923）》（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HKMS163-1-2。「割」、「就正來做」乃廣州方言，前者意即「宰」、「殺」，後者意為持平公正地處理事情。

⁹³ 〈劉公鑄伯〉，《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頁 6。

我姑妄相信他的行為（按指何甘棠退休之事）是被現今的趨勢所迫。如今真理與謬誤、對與錯之間的區別不再涇渭分明。不管一個人盡多大氣力地為華人社區的利益奮鬥，他的努力不僅得不到感激，而且通常還會被許多人批評，如果他的行為不被認為是一種冒犯的話。因此，熱心公益的人們對公共事務熱情不再就不奇怪了。⁹⁴

其境遇、心態與迷思，躍然紙上；時流趨向之脈絡，亦清晰了然。

但是，這些並無損劉鑄伯華人領袖的卓然地位。1922年5月3日，劉鑄伯溘然逝世，香港各界為之震驚不已，中西各報均以顯著位置發佈此消息，指出劉氏逝世是香港政府、香港華人的巨大損失，一致肯定劉氏竭盡心力，為香港的公共事務及社會發展所做出的大量工作和傑出貢獻。⁹⁵5月7日，劉鑄伯出殯，隊伍浩蕩，規模宏大，盛況空前，極盡哀榮。⁹⁶

縱使正面、反面兩相對立的觀感所在多有，但毋庸諱言，當時對劉鑄伯也有客觀公允的評價。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的「訃告」中，有一段分標題為「尷尬的處境」的文字，寫道：

劉鑄伯先生一直力圖在華人圈和外國人圈中尋求一種和諧，並想辦法減少他們之間的摩擦。有些同胞卻聲稱鑄伯先生喝了點洋墨水，老為外國人服務。其實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想盡一切辦法為中國人服務，為他的祖國謀求最大的利益。他經常告誡年輕人一定

⁹⁴ “OBITU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4 May 1922, p. 6.

⁹⁵ “DEATH OF HON. MR. LAU CHU-PAK”,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Hong Kong), 3 May 1922, p. 1; “OBITUARY”,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3 May 1922, p.5; “DEATH OF THE HON. MR. LAU CHU PAK”,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4 May 1922, p. 2; “OBITU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4 May 1922, p. 6; 〈劉君鑄伯逝世及其小史〉，《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2年5月4日，第一張第三頁。

⁹⁶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8 May 1922, p. 4;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8 May 1922, p. 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8 May 1922, p. 7.

要努力學習漢語，永遠都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還經常有由於強烈地批評那些看似跟祖國沒有了聯繫，忘記了中國習俗、中國文化的歸國留學生而被人致信媒體批評他，甚至是污蔑、辱罵。我想，就算是鑄伯先生某些地方做錯了，那也是因為他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迎合各個方面的人。他意識到合作比堅守不妥協的理想主義要有用得多，他一直想尋求一種可以達成合作的媒介。雖然中國人的生活條件還不是很好，但老百姓從過去備受壓制和忽視到能過上今天這種相對自由和舒適的生活而沒有經歷大的動盪，完全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好的領導人。最後的結果也證明瞭他的做法是合理的。⁹⁷

於筆者看來，這是對生長在過渡時代殖民地社會的劉鑄伯最為公允的評價文字，直到今天，仍未曾超越。劉鑄伯逝世已過九十周年，惟餘音仍在，風範長存，影響深遠，及至於今。常言道：蓋棺定論。觀乎此，劉鑄伯的作為舉動、是非功過、名利地位，亦可清白矣，亦可無論矣。

---

⁹⁷ “OBITU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4 May 1922, p. 6.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寶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寶安文史》，第三輯（非公開出版物），1990.12。

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八十輯（793），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朱英和、沈瓊樓，〈清末廣州河南兩間私立學校——育才書社和南武公學〉，政協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第十輯，廣州：內部發行，1963。

段力佩，〈育才中學的歷程〉，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九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香港華字日報》。

《香港華商總會癸丑年征信錄》（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HKMS164-1-81。

《華商公局志事錄（1905-1914）》（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HKMS163-1-1。

《華商公局志事錄（1921-1923）》（縮微膠捲），香港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HKMS163-1-2。

〈督院張批東勸業道詳平湖振興公司總董劉鶴齡等擬在平湖鄉建設商場緣由文（附件一）〉，《兩廣官報》編輯所，《兩廣官報》第十四期（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五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劉富宗等，〈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不署年月）。

《劉鑄伯資料》（影印本），深圳市平湖街道辦事處僑聯提供。

寶安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寶安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嚴雋培，〈上海工部局設立的育才公學〉，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

資料委員會，《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教科文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

The China Mail (《德臣西報》)。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香港孖刺沙西報》)。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士蔑西報》)。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129/187.

二、近人專書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弗蘭克·韋爾什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

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

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香港：香港中華總商會，2002。

東華三院教育史略編纂委員會，《東華三院教育史略》，香港：東華三院壬寅年董事局出版，1963。

保良局百年史略編輯小組委員會，《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香港保良局，1978。

珠海市檔案館、珠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珠海歷史回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楊耀林，《深圳近代簡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管林，《廣東歷史人物辭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2001.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劉澤生，《香港古今》，廣州：廣州文化出版社，1988。

劉仲德，〈守真園話今昔〉，《劫後集》（非公開出版物，未署年月）。

鄭宏泰、周振威，《香港大老——周壽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

賴連三，《香港紀略（外二種）》（李龍潛點校），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n, Wai-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Chung, Stephanie Po-y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Fung, Cornelia Lichauco and Yiu Chuen Wan. *Fung Ping Shan, The Man ,His Life and His Libra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2012.

Lt-Comdr. & Mrs. H. L. Hanslewood.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the Mui Tsai System*. London: the Sheldon Press, 1930.

Stokes, John & Gwenneth.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1987.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Wright, Arnol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Singapore: Graham

Brash, Reprinted, 1990.

三、近人論文與其他著述

王傑、韓明章，〈官督之殤與商辦之傷——論清末香洲商埠衰落之

因由〉，《學術研究》2012：10，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

2012.10，頁 98-106。

王根喜，〈古鎮平湖與傳奇人物劉鑄伯〉，《深圳商報》（深圳），

2003 年 7 月 5 日，B7 版。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網站（www.scaacpa.org.hk）資源。

南華體育會網站（www.scaa.org.hk）資源。

彭全民，〈愛國港胞劉鑄伯及其評價〉，《寶安史志》，總第 15 期，

深圳：深圳市寶安區檔案館，2005.12，頁 52-59。

華若璧，〈妻子、妾侍、婢女：1900-1940 年香港的奴僕與親屬關

係〉，華琛、華若璧著，張婉麗、盛思維譯，廖迪生編輯顧

問，《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37-158。

楊天宏，〈清季自開商埠的地域分佈與外貿場域的拓展〉，氏著，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0，頁 312-344。

蔡惠堯，〈前世今生活深圳——地域變遷與名稱由來〉，《廣東文獻雜誌》36：1，臺北：臺北市廣東同鄉會，2008.1，頁 57-67。

Cheng T. C. “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up to 1941,”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1969, pp.1-30.

M. Carroll, John *Lau Chu-pak*, May Holds 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四、網路資源

上海市育才中學網站

(<http://ws1.yucaish.cn/pages/second.aspx?sort=2> 以及
<http://ws1.yucaish.cn/pages/second.aspx?sort=67>) 資源。

Lau Chu-Pak as a Celebrity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Life, Career, and Significance

Cai, Hui-yao^{*}

Abstract

After Hong Kong was ceded to Great Britain, a locally relevant and feasible capitalist ruling structure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Large progress was reflected in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The crown colony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The miracle of Hong Kong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British ruling policy,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limate, but also largely contributed by the constant striv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for improvement. Amongst them, the Chinese celebrities definitel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Based on immense economic strength, a group of Chinese in Hong Kong rose to the upper social class since the 1850s. They actively called for reform, participated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worked on expanding and improving living space.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y is obvious and far-reaching. Moreover, they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certainly acceler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Lau Chu-pak (1867-1922),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had his origin in Pinghu, Shenzhen. He had been very active in political, commercial, academic and medical circles through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He committed himself for the social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during his term with the Sanitary Board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

^{*} Associate professor, Shenzhen Museum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ile working with the General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ung-wah Hospital, Po Leung Kuk and the Ellis Kadoorie Chinese School Society successively, he endeavored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In respon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Kowloon-Canton Railway, he exclusively invested on setting up the Pinghu New Market in Pinghu, his hometown. The market, regarded as a model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preliminarily secured the central urban function of Pinghu in the conjunction area of Shenzhen, Dongguan and Huizhou.

Lau Chu-pak was quite well-known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Like his Chinese contemporaries,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affairs and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He, however, also had his distinctive thinking pattern and behaviour. Besides, it was obvious to find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 on him.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au Chu-pak,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recognize and measure the role of Chinese celebrities. The study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ociety research or other case studies about Hong Kong.

Key words: Early 20th century, Shenzhen, Hong Kong, Lau Chu-pak, career, significance